
專業主義、新聞自由與市場力量： 回歸後香港新聞界的恆與變

蘇鑰機

摘要

比較1996至2006年三次香港新聞工作者調查所得的結果，我們發現雖然香港社會有很大變化，但新聞工作者信奉的專業主義理念 (media professionalism) 仍然存在。然而，傳媒的整體表現未如理想，傳媒公信力 (media credibility) 下降，自我審查 (self-censorship) 又上升。造成個人專業主義意理受尊崇而傳媒表現欠佳的這種矛盾現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新聞教育的普及、香港新聞自由傳統面臨的挑戰、新聞工作者在作業時必需的自保策略、傳媒市場作為平衡政治壓力的力量等。上述因素的互相激盪，勾畫了過去10年香港新聞業變化的軌跡。

關鍵詞：香港新聞工作者、傳媒專業主義、新聞自由、自我審查、市場力量

蘇鑰機為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他的研究興趣包括：香港報業、新聞與科技、引文分析、傳播學的發展。主要的著作有 *Global Media Spectacle: News War over Hong Kong*、*Press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Case Studies from 1967 to 1997*、《變遷中的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及《電視節目欣賞指數：香港經驗》。電郵：clementso@cuhk.edu.hk

Professionalism, Press Freedom and Market Force: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Hong Kong Journalism Industry after the Handover

Clement Y. K. SO

Abstract

A comparison of three surveys of Hong Kong journalists from 1996 to 2006 finds that media professionalism remains intact in spite of significant socio-political changes. However, the media's performance has been in doubt as reflected in credibility decline and rising self-censorship. Factors accounting for this apparent disjunction between journalists' professionalism and overall media performance include the proliferation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the entrenchment of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s political culture, the journalists' need for a self-defense and survival strategy, and the media market as a balancing force of political pressure. It is the interplay of all these factors that matters.

Keywords: Hong Kong journalists, media professionalism, press freedom, self-censorship, market force

前言

不管是一般香港市民還是新聞工作者，他們都認為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是一個分水嶺，同時也是一個新開始。主權轉移帶來很多重要的變化，例如有政治勢力的重組、政府本身的改革、更多來自中國大陸的影響等。在回歸之初，香港特別行政區預期將會更繁榮，但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令香港走進持續的經濟低谷。政治危機更一浪接一浪，先後有人大釋法、民調事件、二十三條立法、董建華下台、政改方案等爭議，當然還有五十萬人上街示威的震撼場面。社會方面，香港面對一連串的风波，例如禽流感、數碼港、沙士(SARS)疫症、維港巨星匯、西九龍發展爭議等。在回歸後，傳媒又發生胡仙事件、鄭經翰遇襲、「名嘴封咪」、《信報》易手、女星被偷拍、程翔被捕等事件。

上述這些事件如何影響新聞工作者？大家知道中國政府一向對言論管制很嚴緊，香港主權的移交，意味著新聞業者將面臨很大的壓力。新聞傳媒的社會角色吃重，它們在反映民意和主導社會議題的功能上尤其重要性。如果香港有任何社會群體要被迫改變的話，新聞工作者將首當其衝。記者走在社會的前線，與社會脈搏共同跳動，也是最容易感受到壓力的行業。記者的走向和命運，很可能是香港整體社會的縮影。

本文要探討的是，香港新聞界和其身處的政治社會環境之間有何關係。主要的研究論題包括：新聞工作者在回歸前，一向崇尚西方的專業意理和行事準則，在回歸後能否繼續保有這些傳統？他們在近10年的表現如何？具體而言，本文首先比較回歸前後新聞工作者的價值觀、道德標準及傳媒角色，來審視他們對專業主義理念的堅持。其次是透過新聞工作者如何看他們自己的社會地位及傳媒的公信力，來評估傳媒的整體表現。第三是就新聞工作者有專業要求和傳媒實際表現不佳的矛盾現象，提供一個解釋。本文希望能對專業主義、新聞自由及市場力量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提出一些觀察和分析。

本文的資料來源於1996、2001及2006年暑假進行的三次新聞工作者問卷調查。這三次調查有很多共通之處，所用的方法和問卷大致相同，其中包括詢問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價值觀、道德操守準則、傳媒公信力、新聞工作者的社會地位、自我審查等情況。比較三次調查的結果，我們

可以縱向地了解這些範疇的持續與變化。三次調查所採用的方法都是透過不記名的自填問卷，抽樣邀請在主要報章、電台及電視台新聞部工作的記者及編輯參加這些調查，但不包括攝影記者和體育、娛樂版面的編採人員。調查以系統隨機按比例抽樣方式進行，三次的樣本數目分別是553、722及1,004人。在回應率方面，則分別是62%、62%及55%。

典型的香港新聞工作者

典型的香港新聞工作者有甚麼特徵？如表一所示，他們的年紀很輕，教育程度高但收入不多。性別方面，男與女的比例相若，各佔一半。他們的平均年齡只是略高於30歲。教育程度有持續上升趨勢，在2006年超過九成有專上教育水平，並且有14%的新聞工作者擁有碩士學位。香港的新聞及傳播教育對新聞界來說，是重要的基礎(Leung, Chu, & Lee, 2006)。超過一半(53%)的新聞工作者有新聞傳播的學士學位，另有部分人(17%)曾在校修讀過新聞科目。香港新聞工作者的薪酬待遇不高，在2006年的月薪中位數不足兩萬港元，比5年前減少了。他們在新聞界的年資也不算長，平均只有約7年，在目前任職的新聞機構只是平均服務了兩年半。但可喜的是，與過去10年相比，這些數字已有明顯上升，顯示這個行業的流動性雖高，但近年有稍緩跡象。

如果他們要離開新聞界的話，在2006年的首要原因是薪酬低，接下來是工作影響家庭生活和壓力太大。但在1996年，前三個要離開的原因分別是新聞自由缺乏前景、新聞工作受到政治干預、薪酬低。為何有這些變化？回歸前大家對新聞自由的前景感到十分悲觀，這種情緒蓋過所有其他離職原因。但回歸後新聞工作者發覺實際情況沒有預期那麼差，政治的影響就算有，其形式也是比較間接和沉潛。甚至有人覺得回歸後是一個政治悶局，市民和新聞界都有「非政治化」的傾向，或是把政治新聞娛樂化處理，報章出現很多「政治八卦」的版面欄目。事實上，「不要談政治」、「政治新聞沒人看」、「政治新聞要有娛樂性」成為新聞工作者的一種壓力，可能成為「自我審查」施壓者的一種辯解。因此在近年新聞工作者感受至深的問題，變得和其他行業一樣，回復到薪酬低、壓力大、缺乏進修和升職機會等一般的困擾。

表一 香港新聞工作者的入口特徵及工作情況

	年份		
	1996 (N=553)	2001 (N=722)	2006 (N=1,004)
性別 (男性)	55.1%	49.9%	49.6%
年齡 (中位數)	30	30-34	30-34
教育程度：			
碩士	7.3%	11.8%	14.5%
大學 (本科)	37.4%	54.5%	57.1%
專上 (非學位)	43.0%	26.6%	21.0%
中學或以下	12.3%	7.1%	7.4%
在學時新聞訓練：			
主修新聞傳播	49.3%	54.0%	53.4%
選修新聞科目	12.6%	16.7%	17.2%
沒有選修	38.1%	29.2%	29.4%
月薪 (中位數)	HK\$16,500	HK\$20,000-24,999	HK\$15,000-19,999
新聞工作經驗 (中位數)	65月	74月	86月
在目前機構任職時間 (中位數)	24月	27月	30月
為何離開新聞界	1. 新聞自由缺乏前景 (40.8%) 2. 新聞工作已受到政 治干預 (34.6%) 3. 薪酬低 (33.0%) 4. 新聞方針不合己意 (29.6%) 5. 壓力太大 (27.9%)	1. 薪酬低 (42.7%) 2. 壓力太大 (36.2%) 3. 缺乏學習進修機會 (31.2%) 4. 缺乏升職機會 (28.6%) 5. 工作時間無規律 (28.1%)	1. 薪酬低 (51.4%) 2. 對家庭生活有影響 (37.5%) 3. 壓力太大 (34.1%) 4. 缺乏升職機會 (26.3%) 5. 工作時間無規律 (25.1%)
將來工作性質	1. 工商界 (22.3%) 2. 非新聞性的大眾傳 媒 (21.4%) 3. 教育 (9.4%) 4. 公關 (6.7%)	—	1. 非新聞性的大眾傳 媒 (25.5%) 2. 工商界 (15.0%) 3. 公關 (9.9%) 4. 教育 (8.0%)
工作滿意度	35.3%	—	39.4%
工作自主性	43.4%	—	42.6%
經常閱讀報紙	1. 《東方日報》 (52.9%) 2. 《明報》 (51.4%) 3. 《蘋果日報》 (51.4%) 4. 《信報》 (25.0%) 5. 《經濟日報》 (23.4%)	1. 《蘋果日報》 (70.4%) 2. 《明報》 (54.8%) 3. 《東方日報》 (44.3%) 4. 《經濟日報》 (30.7%) 5. 《信報》 (19.9%)	1. 《蘋果日報》 (75.9%) 2. 《明報》 (50.3%) 3. 《東方日報》 (38.0%) 4. 《經濟日報》 (31.6%) 5. 《星島日報》 (22.2%)

他們如果要轉到別的行業，首選仍是和傳媒有關(但非新聞)的工作，例如公共關係，也有人對工商界及教育界表示興趣。在過去10年，新聞工作者在工作滿意度及工作自主性方面，都保持穩定。接近四成的被訪者滿意自己的工作，自主程度方面就有近半的人認為滿意。在本土和國家認同上，香港新聞工作者仍然以本土關懷為主，但對中國的認同日益增加。在2006年，新聞工作者對香港的認同有9.1分(滿分是10)，對中國的認同則有7.9分。以往的看法，是對香港的認同和對中國的認同是對立的，但現時大家覺得兩者可以沒有矛盾，甚至能整合起來。這趨勢在回歸之後更見清晰。

在香港新聞工作者經常閱讀的報紙中，在1990年的前四名分別是《明報》、《東方日報》、《南華早報》和《信報》。後來《蘋果日報》在1995年創刊，《經濟日報》近年也漸受行內重視，有些報紙的受歡迎程度下降。在2006年則以《蘋果日報》居首，接下來是《明報》、《東方日報》、《經濟日報》和《星島日報》，可見近十多年來香港報紙地位的變化。

專業主義的信念

在民主自由的社會，傳媒專業主義(media professionalism)是新聞學的核心概念(Soloski, 1989; Tuchman, 1978)。簡言之，傳媒專業主義認為，新聞工作者是獨立的專業人士，他們受過專門訓練，以特殊技能服務大眾，並在工作中遵守一些彼此認同的價值、規範和道德原則。這些共有的價值和規範包括準確、客觀、中立、公正、時間性等(羅文輝等，2004)。雖然有論者已揭開客觀和中立諸概念的神秘面紗(Lee, Chan, & So, 2004; Reese, 1989; Tuchman, 1972)，也有人懷疑新聞業的專業性是否足夠(Dennis & Merrill, 2002)，但這些理念在新聞實際工作中仍佔主導地位，絕大部分新聞工作者在個人層面都信奉這些專業理念。在香港及其他國家的新聞課程中，專業主義仍是重要的組成部分(Chan, Lee, & Lee, 1996)。專業主義的重要作用是在令新聞工作顯得合理化(legitimated)，記者透過收集材料及鑑定真偽，並用一種客觀的新聞體裁來作報道(Tuchman, 1978)。另一項專業主義的要求，是新聞媒體要扮演的角色(Weaver, Beam, Brownlee, & Voakes, 2007)，其中最重要的職能

是新聞傳媒要成為社會的「第四權」，在發放資訊的同時又監察政府的表現，並可能要扮演反對者 (adversary) 的角色。

當專業主義在自由資本主義制度茁壯成長時，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引入了市場機制後，一種初級的傳媒專業主義也在萌芽 (Pan & Chan, 2003)。當然，中國的新聞傳媒仍受到嚴格的意識形態控制。專業主義和社會主義傳媒體制的矛盾，令研究者 (Chan & Lee, 1991) 懷疑香港回歸到中國旗下之時，它的「新聞範式」(journalistic paradigm) 會否隨之轉移。在下面我們會看到，香港新聞工作者面對的自我審查情況愈趨嚴重。因此我們想了解，在回歸這10年間，新聞界的專業主義情況究竟如何。

表二 香港新聞工作者對傳媒功能的看法

	年份		
	1996 (N=553)	2001 (N=722)	2006 (N=1,004)
依據事實報道最近發生的事件	4.55 (1)	4.67 (1)	4.45 (1)
迅速地為大眾提供新的訊息	4.44 (2)	4.55 (2)	4.40 (2)
報道可靠訊息以阻止流言的散播	4.31 (3)	4.36 (3)	4.17 (3)
對複雜的問題提供分析與解釋	4.18 (4)	4.31 (4)	4.13 (4)
幫助市民了解政府的政策	3.98 (6)	4.15 (6)	4.06 (5)
幫助市民實行輿論監督	4.05 (5)	4.16 (5)	4.03 (6)
對形成中的政策展開討論	3.87 (8)	4.12 (7)	4.02 (7)
教育群眾，提高他們的知識與文化	3.73 (9)	3.93 (9)	3.94 (8)
質疑並批評政府官員的言行	3.69 (10)	3.89 (10)	3.84 (9)
成為市民的喉舌	3.96 (7)	3.99 (8)	3.82 (10)
質疑並批評工商界的言行	3.64 (12)	3.83 (11)	3.79 (11)
質疑並批評社會團體的言行	3.61 (13)	3.78 (12)	3.77 (12)
報道最大多數市民感興趣的新聞	3.68 (11)	3.72 (14)	3.76 (13)
聲援社會弱勢團體	3.00 (18)	3.60 (17)	3.70 (14)
對政府的政策作出解釋	3.47 (15)	3.76 (13)	3.69 (15)
推動社會改革	3.49 (14)	3.63 (15)	3.61 (16)
為市民提供娛樂和休閒	3.35 (16)	3.63 (15)	3.59 (17)
引導公眾輿論	3.30 (17)	3.55 (18)	3.59 (17)

註：表中全部數字基於5分制的量表，5分代表非常同意，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括弧內的數字代表排名。

表二顯示自1996到2006年，香港新聞工作者眼中的傳媒功能。從三次調查的結果可見，他們仍然推崇一些基本的專業價值，其整體的想法相當穩定。新聞工作者認為，最重要的專業價值是根據事實快速和可靠地報道新聞。具體而言，新聞工作者特別重視：(一)依據事實報道最近發生的事件；(二)迅速地為大眾提供新的訊息；(三)報道可靠訊息以阻止流言的散播；(四)對複雜的問題提供分析與解釋。相反來說，新聞工作者覺得最不重要的是：(一)引導公眾輿論；(二)為市民提供娛樂和休閒；(三)推動社會改革；(四)對政府的政策作出解釋。新聞工作者看重客觀和公正的報道，不願意和政府眉來眼去，也較輕視新聞的娛樂休閒功能。換言之，對新聞工作者來說，傳媒的監察功能才是最重要的，倡導(advocacy)的角色只屬次要。

表三 香港新聞工作者對一些採訪手法的看法

	年份		
	1996 (N=553)	2001 (N=722)	2006 (N=1,004)
違反不透露消息來源身分的承諾	1.35 (1)	1.46 (1)	1.46 (1)
未經許可而使用被訪對象的機密文件	1.78 (3)	1.85 (3)	1.79 (2)
付錢以獲取機密消息	1.73 (2)	1.80 (2)	1.90 (3)
假扮他人以獲取資料	1.82 (5)	2.12 (4)	1.92 (4)
未經許可使用私人文件	1.94 (6)	2.12 (4)	1.94 (5)
引用其他傳媒的報道而不註明出處	2.25 (9)	2.48 (9)	2.17 (6)
未經許可轉載文章	1.81 (4)	2.12 (4)	2.24 (7)
以煽情手法處理新聞	2.04 (7)	2.37 (8)	2.29 (8)
為廣告客戶或新聞來源寫宣傳稿	2.12 (8)	2.25 (7)	2.33 (9)
直接採用被採訪單位準備的稿件	2.43 (10)	2.72 (11)	2.62 (10)
未經被訪者同意暗中錄音、拍照、錄影	2.61 (12)	2.66 (10)	2.74 (11)
隱藏身分進入被訪機構工作以獲得被訪者 不願公開的訊息	2.54 (11)	2.76 (12)	2.82 (12)
糾纏消息來源直至獲得消息	3.09 (13)	3.29 (13)	2.95 (13)
與同行交換採訪資料	3.59 (14)	3.97 (14)	3.81 (14)

註：表中全部數字基於5分制的量表，5分代表絕對可以接受，1分代表絕對不可以接受。括弧內的數字代表排名。

表三顯示香港新聞工作者對一些採訪手法的意見。他們最不能接受的手法依次是：(一)違反不透露消息來源身分的承諾；(二)未經許可而使用被訪對象的機密文件；(三)付錢以獲取機密消息；(四)假扮他人以獲取資料；(五)未經許可使用私人文件。在三次調查中，這些手法的排名格局基本沒有改變；在不同時期對這些手法的不滿程度也相若。可見近10年來，香港新聞界的專業主義和價值觀沒有甚麼改變，基本上沿襲了西方的理念和追求。

除了一般的社會監察功能，新聞工作者特別重視監察政府的表現，並在有必要時提出批評。如表二所示，新聞工作者認為傳媒批評政府要比解釋政府政策來得重要。回歸之後，香港傳媒應否在社會有危機的時候，於國際間公開批評特區政府，有過多番討論。表四顯示，對於「傳媒為了社會穩定不應批評政府」這種論調，新聞工作者不表認同。他們反對傳媒因為要「顧全大局」而放棄一些自由，新聞傳媒也不應在批評政府的時候要特別「體諒」。有人認為傳媒的批評有「唱衰」香港或分裂社會的效果，但新聞工作者並不這樣看。總而言之，香港的新聞工作者採納了西

表四 香港新聞工作者對傳媒社會角色及後果的看法

	年份		
	1996 (N=553)	2001 (N=722)	2006 (N=1,004)
為了保持香港社會穩定，新聞界不應該常常批評政府	1.75	1.67	2.04
為了顧全大局，新聞界放棄一點自由是應該的	2.22	1.72	2.08
傳媒批評特區政府的時候，應該體諒政府的困難	-	2.35	2.52
傳媒批評中央政府的時候，應該體諒政府的困難	-	2.26	2.48
傳媒在報道新聞時往往不顧市民私隱	-	3.39	3.39
香港傳媒對政府的批評打擊了政府的威信	-	2.56	2.69
香港傳媒的道德操守非常低落	-	3.11	3.27
傳媒是向中央政府反映香港市民意見最有效的渠道	-	3.38	3.50
香港傳媒批評政府，等於在國際間唱衰香港	-	1.68	1.91
香港傳媒的言論產生了分化社會的效果	-	2.50	2.82

註：表中全部數字基於5分制的量表，5分代表非常同意，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

方的新聞觀點，認為傳媒應扮演獨立監察者的角色。在香港回歸之前和後，新聞工作者的看法沒有太大改變。

但如果比較表四中2001和2006年的數字，在很多個問題項目中，新聞工作者對傳媒社會角色的看法有了一些轉變。雖然整體而言在2006年他們仍認為傳媒應該批評政府，不要有太多顧忌，但這些想法的強烈程度就未及在2001年時。這個趨勢值得注意，它可能反映新聞工作者近年面對的壓力增加了，因而要調整自己的想法，來處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

總體來說，雖然香港在過去10年經歷了巨大的政治和社會變遷，傳媒專業主義的信念仍在。儘管香港新聞工作者常受到批評，被指表現欠佳，甚至他們自己也有相同的看法，但他們心中仍基本保持相同的專業理想，未受到大環境的改變而動搖。至於他們能否完全堅持這些信念，在日常工作中是否要妥協或被迫放棄理想，則可能是另一回事。

自我審查與公信力下降

自中英兩國政府在1984年簽訂聯合聲明，決定於1997年將香港的主權歸還中國以來，香港新聞界對新聞自由和自我審查的憂慮就未有停止。自我審查 (self-censorship) 是指在報道新聞時，對一些被權力中心(如北京政府、特區政府和大企業)視為敏感的新聞，不加報道或淡化處理 (Lee, 1998)。自我審查可以理解為主要是在機構層面出現的，但壓力從上而下延伸到新聞工作者的個人層面。自我審查的情況是新聞自由的一項指標，也反映了新聞工作者面對的各種政治和經濟限制 (陳景祥，2003；Cheung, 2003)。當中國大陸對香港有更大的影響時，一般人預期香港的自我審查情況將更為普遍。

在1996年的新聞工作者調查中，我們透過間接的方式來量度自我審查。調查旨在探討新聞工作者在批評中國政府時會否感到憂慮。52.4%的被訪者承認有這種憂慮，顯示中國政府對新聞工作者的確構成頗大壓力 (相對而言，只有5.5%的被訪者表示在批評香港政府時有憂慮)。在其後的兩次調查，我們用較直接的問法來評估自我審查的嚴重性。表五顯示，2006年的自我審查情況變得較嚴重，有29%的新聞工作者認為這是

表五 香港新聞工作者對傳媒表現、自我審查及國家利益的評價

	年份		
	1996 (N=553)	2001 (N=722)	2006 (N=1,004)
新聞工作者的社會地位評分	6.14	5.86	5.85
整體新聞傳媒的公信力評分	5.96	6.35	5.81
報紙的公信力評分	5.74	6.04	5.59
電子傳媒的公信力評分	6.58	7.08	6.36
香港新聞界有沒有「自我審查」：			
有，而且很嚴重		14.0%	29.2%
有，但不是很嚴重		61.2%	51.9%
有少少	-	21.7%	15.3%
完全沒有		3.1%	3.5%
新聞工作者所屬工作機構：			
對香港的傾向	6.62	6.88	6.61
對中國的傾向	6.15	6.25	6.37
對中上社會階層的傾向	5.28	5.69	5.59
當香港和中央有利益衝突，香港傳媒應該：			
維護香港利益	43.0%	31.6%	38.8%
保持中立	55.3%	67.3%	58.0%
維護中央利益	1.7%	1.1%	3.2%

註：除了那些用%來表達的數字外，其餘數字基於10分制的量表，10分代表最高，1分代表最低。

個嚴重問題，而52%則說它存在但不算嚴重。五年前的相應數字只是14%和61%。調查的其他數據也顯示，在2006年51%及39%的被訪者認為，香港新聞傳媒曾分別淡化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的負面消息。

新聞傳媒所面臨的政治壓力，有時可見於中國大陸和香港之間的利益矛盾。我們在調查中，邀請新聞工作者評估他們自己所屬的機構，對香港、中國和本地社會階層的立場。整體而言，香港傳媒機構面向不同的社會階層，各有目標受眾，10年來的取向相當穩定。政治認同方面，新聞機構願意採用「親香港」的立場，即它們會以香港人的角度看事物，並為香港人的利益發聲。新聞傳媒的這種本地化傾向，比它們採納中國

的立場要強一些。但近年持續的趨勢是，傳媒認同中國的立場有些微的增強，由6.15分增至6.25分及最近的6.37分。如果香港和中國之間存有矛盾，58%的新聞工作者表示傳媒在報道時應保持中立。但也有39%的人認為應採取香港立場，比持有中國立場的(3%)明顯要多。如何理解這些數字？除了專業主義意識和本土認同(馬傑偉，2003)發揮作用外，另一個含義可能是，新聞傳媒的生存繫於本土市場。本文稍後將指出，傳媒依存於本地社會的現實情況，可以防止它過度偏向中國官方，從而出現嚴重的自我審查。

另一項重要的傳媒表現指標，是各新聞機構所獲的公信力(credibility)評分。公信力是指公眾覺得傳媒可信、有專業知識、報道真確、客觀、公正和對社會有關懷(羅文輝，1994)。真實傳媒公信力的高低，視乎新聞機構在遇到政治壓力和市場競爭時，能否堅持專業主義的精神和做法。如表五所示，自1996至2001年，整體新聞公信力由5.96分上升至6.35分，但到2006年就回落到5.81分。報紙和電子傳媒兩方面，我們也發現相同的走勢。與此相關的傳媒表現指標，是新聞工作者的社會地位。近10年的數字可見，新聞工作者自覺其社會地位日益下降，與傳媒得到的負面評價互相脗合。在1996年，新聞工作者(6.14分)的社會地位低於護士(6.37分)但高於警察(5.88分)。到了2001和2006年，新聞工作者(5.86/5.85分)的社會地位下降不少，均低過護士(6.30/6.32分)和警察(5.94/6.06分)。

導致這種下滑情況的原因有二，一是部分新聞傳媒為吸引讀者觀眾，不惜採用煽情(sensational)的報道手法。新聞工作者自己也承認，傳媒的道德水平低落，特別是一些傳媒侵犯市民的私隱，令新聞工作者也感不滿(見表四)。第二個原因是一些傳媒的政治立場逐漸向中央政府靠攏。一般而言，當一家新聞機構用較客觀、準確和持平的方式來處理新聞，而其立場與香港市民大眾的立場一致，它就會享有較高的公信力。市場的煽情報道手法和政治立場的取態，決定了一家新聞機構的公信力。這兩個因素也正好說明了為何一些持「親港」立場的精英報紙，獲得很高的公信力評分，而大眾化(傾向煽情)的報紙或「親中」報紙，就被認為公信力較低(蘇鑰機、陳韜文，2006)。

專業主義和傳媒表現的脫序

上述的分析勾畫出一個強烈的對比：一方面在個人層面新聞工作者仍抱有專業主義的信念，另一方面香港傳媒的整體表現欠佳，特別反映於機構層面的自我審查上升及公信力下降。我們應如何理解專業主義理想和傳媒表現欠佳之間的鴻溝？在回歸10年期間，有兩個因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第一個因素是香港傳媒之間的激烈市場競爭（蘇鑰機，2003）。新聞傳媒機構的數目增加，更多的收費電視和免費報紙在近年湧現。自1990年代起，新加入的傳媒機構包括《蘋果日報》、《太陽報》、《都市日報》、《頭條日報》、《AM730》、有線電視、新城電台、香港寬頻、NOW等。很多新聞機構都增設了網上版，無線電視（TVB）和亞洲電視又加設24小時新聞頻道。然而，香港的廣告市場卻沒有相應的增長，令傳媒經營日益困難，導致部分傳媒要靠煽情報道求存，爆發連串侵犯私隱和不當報道事件（施清彬，2006；梁偉賢，2003）。結果是令公眾嘩然，對傳媒的信心下降，新聞工作者的社會地位也受影響。

第二個因素是自回歸後一些新聞傳媒擁有權的易手（馮應謙，2003）。在過去10年，下列傳媒就曾經轉換老闆：《星島日報》、《英文虎報》、《南華早報》、《明報》、《成報》、《信報》及亞洲電視。這些新老闆當中，很多都在中國大陸有投資。中央政府作為香港主權的新擁有者，雖然未有直接插手香港的具體事務，但其無形影響在很多方面都比回歸前大得多。中央政府利用各種經濟利益和政治手段，試圖吸納香港的傳媒老闆，令它們在報道方針上對中央更為「友善」。這種政策反映在日常編採工作時，便構成了自我審查的壓力。

激烈的市場競爭容易引發煽情新聞，而政治吸納就帶來自我審查，兩者皆有損傳媒的公信力和新聞工作者的社會地位。但這些較負面的情況只反映香港新聞傳媒的一面。錢幣的另一面則比較正面，我們想了解為何當自我審查漸趨嚴重的時候，專業主義的信念仍有其生命力？

研究傳媒專業主義的學者指出，美國新聞史上出現專業主義是在1830年代，當時市場民主制度（market democracy）正在崛興（Schiller，

1980; Schudson, 1978)。之前盛行的傳媒黨派思潮 (media partisanship)，正逐漸被講求客觀的理念取代。「便士報刊」(penny press) 的出現，代表了普羅大眾取代了政黨的影響，報紙老闆有了新的服務對象。很多人批評以市場為依歸的新聞學，指它引來煽情、色情和血腥報道，令新聞變得膚淺和娛樂化，混淆了真假對錯 (李月蓮，2000；蘇鑰機，2003)。但市場導向的新聞觀也有其優點，例如當它要吸引盡量多的受眾時，新聞工作者就要回應受眾的需要，不能和社會脫節 (McManus, 1994; Underwood, 1993)。

傳媒專業主義奠基於市場機制，而回歸後的香港傳媒市場仍然有活力，絕大部分新聞傳媒以商業邏輯運作，因此專業主義可以繼續滋長。香港新聞工作者十分清楚要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如果自我審查的動作太過分，或是煽情報道走到極端，結果只會令新聞機構的公信力受損，讀者和觀眾就不再支持這家傳媒機構。所以說市場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產生誘因令煽情主義盛行，另一方面它又限制了煽情主義的過分擴張和自我審查的強度。專業主義強調中立性，新聞工作者可因應情況而善用之，在不同的要求 (例如煽情的尺度、新聞自由與自我審查的矛盾) 之間，試圖求取平衡。

香港市民依靠傳媒來監察社會情況及表達意見，傳媒機構千萬不可被公眾認為它放棄了專業主義來刻意討好中央政府，否則對傳媒機構的聲譽有重大傷害，甚至在本土市場上會影響其經營收益。換言之，雖然長遠來說中國大陸的龐大市場對香港傳媒老闆有很大吸引力，但專業主義的考慮卻能令香港傳媒與本土利益緊密掛鉤。對傳媒機構來說，本地市場的反應是最即時的利益關注。正因如此，儘管一些老闆想兼顧中央政府和中國市場，本地的傳媒不能太偏離本土民眾的想法。

就如《蘋果日報》(梁麗娟，2006；蘇鑰機，1997) 和香港電台，它們代表的是敢於批評的聲音，正是言論自由的象徵和寒暑表。《蘋果日報》近年成為新聞工作者最常看的報紙，表示行內重視它的言論立場，在工作時要參考它的報道。香港電台是政府部門，其言論卻常與政府不咬弦，令政府很沒趣。但自詡為公營廣播者的香港電台卻很受公眾愛戴，其公信力評分在多次調查中均名列第一。有了這些「敢言」傳媒的存在，其他競爭對手要考慮自己在市場上相應的定位，不能太任意而行。新聞

工作者面對政治和社會的變動，如何能安身立命？他們採用一向奉行的專業主義作為行事準則，是最自然和有利的。

一旦專業主義被提升到成為新聞範式的地位，它就有了恆久的特質 (Chan & Lee, 1991)。正如其他新聞範式一樣，專業主義有本身的傳統和慣性，除非受到重大的內外因素影響，否則不輕易改變。專業價值和操守，同時也透過正規教育和新聞運作流程中的社教化 (socialization) 來傳遞。如前所述，過半數的香港新聞工作者畢業於新聞傳播科系，另有近兩成會修讀新聞科目。香港的新聞教育課程，都植根於西方的新聞理念和專業意理 (Nerone, 1995)。除少數的黨派報紙員工外，大部分香港新聞工作者都曾受專業意識形態的薰陶，並每天在工作中力圖實踐這些專業理念。這並非說專業主義可以防止自我審查的出現，但它可以作為新聞工作者有用的思想工具，用以抵抗政治壓力，在報道敏感消息時有所依歸。在公眾論及傳媒或其他社會行業的表現時，專業主義往往是一個重要的準則。不論是在新聞界或醫學、法律、會計等其他專業，香港和中國大陸之間的一個區分象徵，就是專業主義。在2003年發生的沙士疫症，香港的醫療人員表現優異，展現捨身救人的高尚情操，就是一個例子。雖然中國大陸近年在經濟領域上突飛猛進，但其專業主義仍待進一步發展。事實上，專業主義作為普遍的價值觀念，可被視為香港的一個核心價值。

鍾情於專業主義的信念，是香港獨特政治歷史文化的產物。香港人希望新聞傳媒扮演監察者的角色，並在有需要時敢於批評當權者 (Lee, Chan, Pan, & So, 2002)。一般香港人都認為傳媒要成為獨立的運作系統，高教育水平的市民更是自由傳媒的堅定支持者 (Lee, Chan, & So, 2005)。香港是一個自由和多元的社會，但民主程度不高，民主發展步伐太慢，在體制上傳媒有需要扮演「代議功能」(surrogate democracy function) (Chan & So, 2003)。傳媒不單要敢於批評權力擁有者，並要提供言論平台，讓公眾表達意見，以推動和整合輿論。所以說，雖然政府會覺得活躍的新聞界時常給政府帶來不便，但就多次承認新聞自由是香港賴以成功的一項要素。很多跡象表明，香港人有共識要維持一個自由的傳媒體制，因此也支持專業主義的繼續存在。

政治控制和市場力量之間有某種張力，提供了生存空間給傳媒專業

主義。傳媒市場作為一種平衡的力量，令個人層面的專業主義可以繼續成為新聞工作者追求的理想，又可作為他們在工作上的一種重要生存策略(Tuchman, 1972)。當他們遇到機構層面(如上司、老闆、政府官員等)的壓力，新聞工作者可高舉專業主義的旗幟，義正詞嚴地加以抵抗。但我們也要承認，在現實中傳媒機構以及個人的確有進行自我審查及煽情報道，可見專業主義的信念並不能完全得到貫徹。新聞工作者面對來自機構層面的壓力，感到無奈甚至要妥協。重要的是專業主義已經成為新聞工作者自我選擇的理念，以求在政治敏感的時刻中，仍能盡力堅守工作崗位。

結 論

回顧過去10年的香港新聞界，我們發覺傳媒專業主義的信念未有改變。雖然整體社會和政治環境有重大變化，但專業價值理念和自由報業體制仍是新聞工作者的共識。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新聞行業固有的專業文化傳統、新聞工作者在大學時受到的相關訓練、香港政治文化中對新聞自由的推崇和捍衛、新聞工作者需要一種自我防衛的策略、市場力量作為一種平衡勢力等。

傳媒專業主義信念仍存，但在實踐中能否貫徹？無可否認，新聞工作者個人的專業理想和傳媒的實際運作之間存有鴻溝。自我審查的上升、傳媒公信力及新聞工作者社會地位的下降，都是明顯的證據。中國政府成為香港主權的擁有者，令香港新聞界的自我審查情況加劇，其中涉及傳媒機構擁有權的易手和當權者對傳媒的進一步招攬吸納。傳媒市場化常被人視為引致煽情主義泛濫的元兇，原來它反過來可以抑壓自我審查，令專業主義有一定的生存空間。

回歸後的香港，新聞自由受到壓力但並非奄奄一息。如果中國政府不採取高壓手段來打擊香港的傳媒市場，我們認為傳媒的專業價值觀仍受尊崇，其監察功能可以繼續。任何對新聞界的明顯打壓，將被視為對「一國兩制」原則的破壞。我們相信出現這種情況的機會很低。根據過去10年的經驗，我們預期中國大陸和香港在很多方面將進一步連結起來，而中港之間的一些張力在未來仍會持續。

香港新聞工作者不應鬆懈，他們應該繼續堅持專業精神，並努力促進有利專業主義發展的各項條件，從而向公眾提供更佳的社會服務，拓展公共空間(Schudson, 1995)。具體而言，應推動新聞工作者的在職訓練，建立新聞界內部的凝聚力、賞罰機制和使命感，加強道德操守意識，糾正過分煽情的新聞處理手法，關注傳媒老闆的動向，力抗政治自我審查，提防政治經濟勢力對新聞的干擾，及提倡公共新聞(public journalism) (Glasser, 1999)。在公眾方面，可以積極推展對市民特別是學生的傳媒教育(李月蓮, 2003)，提高公眾的品味，鼓勵市民監察傳媒的表現，並呼籲他們用實際的(購買或收看)行動來支持有公信力的傳媒。

參考文獻

- 李月蓮(2000)。〈市場導向下的傳媒自由與放縱〉。《思》，1月，頁4-7。
- 李月蓮(2003)。〈傳媒教育與公民意識〉。李少南(編)，《香港傳媒新世紀》(頁231-25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施清彬(2006)。《香港報業現狀研究》。香港：香港中國新聞出版社。
- 馬傑偉(2003)。〈權力、媒體與文化〉。李少南(編)，《香港傳媒新世紀》(頁197-211)。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梁偉賢(2003)。〈常見恆存的傳媒操守問題〉。李少南(編)，《香港傳媒新世紀》(頁139-162)。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梁麗娟(2006)。《蘋果掉下來》。香港：次文化堂。
- 陳景祥(2003)。〈九七後的言論空間〉。李少南(編)，《香港傳媒新世紀》(頁17-34)。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馮應謙(2003)。〈媒體競爭、擁有權及政治過渡〉。李少南(編)，《香港傳媒新世紀》(頁71-98)。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羅文輝(1994)。〈新聞媒介的可信度：三種研究取向的分析〉。臧國仁(編)，《新聞學與術的對話》(頁177-195)。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 羅文輝等(2004)。《變遷中的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蘇鑰機(1997)。〈完全市場導向新聞學：《蘋果日報》個案研究〉。陳韜文、朱立、潘忠黨(編)，《大眾傳播與市場經濟》(頁215-233)。香港：鑪峰學會。
- 蘇鑰機(2003)。〈市場導向下的新聞傳媒〉。李少南(編)，《香港傳媒新世紀》(頁99-124)。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蘇鑰機、陳韜文(2006年12月29日)。〈新聞公信力創新低、記者市民評價不同〉。
《信報》，第13版。
- Chan, J. M., & Lee, C. C. (1991).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Hong Kong press in China's orbit*.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Chan, J. M., Lee, P. S. N., & Lee, C. C. (1996). *Hong Kong journalists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an, J. M., & So, C. Y. K. (2003). The surrogate democracy function of the media: Citizens' and journalists' evaluations of media performance. In S. K. Lau, M. K. Lee, P. S. Wan, & S. L. Wong (Eds.),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2001* (pp. 249–276).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eung, A. S. Y. (2003). *Self-censorship and the struggle for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The Hague, Netherlands; New York: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 Dennis, E. E., & Merrill, J. C. (2002). *Journalism is a profession*. In *Media debates: Great issues for the digital age* (3rd ed., pp. 181–191). Belmont, CA: Wadsworth.
- Glasser, T. L. (Ed.). (1999). *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Lee, C. C. (1998). Press self-censorship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Hong Kong.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3(2), 55–73.
- Lee, C. C., Chan, J. M., Pan, Z., & So, C. Y. K. (2002). *Global media spectacle: News war over Hong Kong*.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ee, F. L. F., Chan, J. M., & So, C. Y. K. (2004, May). *Politics of objective journalism in China's Hong Ko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4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USA.
- Lee, F. L. F., Chan, J. M., and So, C. Y. K. (2005). *Evaluation of media and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s: The role of education among Hong Kong citizen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5(1), 37–56.
- Leung, K. W. Y., Chu, L. L., & Lee, P. S. N. (2006).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Hong Kong. In K. W. Y. Leung, P. S. N. Lee, & J. Kenny (Eds.), *Global trends i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pp. 189–209).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McManus, J. H. (1994). *Market-driven journalism: Let the citizen beware?* Thousand Oaks, CA: Sage.
- Nerone, J. C. (Ed.). (1995). *Last rights: Revisiting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Pan, Z., & Chan, J. M. (2003). Shifting journalistic paradigms: How China's journalists assess "media exemplar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0(6), 649–682.
- Reese, S. D. (1989). The news paradigm and the ideology of objectivity: A socialist a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7, 390–409.
- Schiller, D. (1980). An historical approach to objectivity and professionalism in American news report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9, 46–57.

- Schudson, M.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 Schudson, M. (1995). *The power of new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oloski, J. (1989). News reporting and professionalism: Some constraints on the reporting of the new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1, 207–228.
- Tuchman, G. (1972). 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7, 660–679.
- Tuchman, G. (1978). Professionalism as an agent of legitim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8(2), 106–113.
- Underwood, D. (1993). *When MBAs rule the newsroom: How the marketers and managers are reshaping today's me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eaver, D. H., & Beam, R. A., Brownlee, B. J., & Voakes, P. S. (2007).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21st century: U.S. news people at the dawn of a new millennium*.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鳴謝

本文獲香港研究資助局(項目CUHK4136/04H)在財政上的支持，謹此致謝。本研究由蘇鑰機及陳韜文共同構思和進行，英文稿也是兩人合作撰寫。現時經擴充的中文版本只由蘇鑰機執筆。